

#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出土唐《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 楼兰路截踪事》文书<sup>\*</sup>

胡兴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2019~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唐代纸质文书、木简 883 件,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其中军事文书数量最多。唐《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楼兰路截踪事》(以下简称《横岭烽》文书)是一件关于焉耆镇在楼兰路沿途设置各级军事设施,进行戍守管理的军事文书,保存较为完整,现将文书进行初步释读研究。

文书出土时呈团状,修复后呈长方形。文书质地为麻纸,呈棕灰色,韧性较强,仅局部有破损。长 27.5、宽 18.5 厘米。文书单面楷书墨写,字迹潦草,行间有加字,部分字迹上有涂抹痕迹,无朱印。文书现存文字 5 行,共 49 字。录

文如下(封三):

横岭烽状上通海镇]委(楼)阑(兰)路截踪]右奉处分,每日截上件路踪,并无按(鞍)]马之踪,唯有牛踪下来。谨录状上谨状]牒件状如前谨牒

该文书是关于横岭烽向其上级机构——通海镇汇报辖区内近期巡逻情况的牒状。“状”为唐代上行公文文体的一种,多有“谨录状”“牒件状如前,谨牒”等文字<sup>[1]</sup>。横岭烽为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是治所在沙堆烽的游弈所管理的烽燧之一,属于最基层的军事机构。横岭烽先向游弈所汇报本烽燧管辖范围内的巡查情况,游弈所根据横岭烽汇报的牒状材料,以横岭烽的名义转写呈报通海镇。该文书字迹潦草,有涂抹污渍,且无朱印,推测其应为游弈所上书的草稿件,正式呈报公文应已盖章并上报,横岭烽状至游弈所的牒状原件或尚未发现。

文书记载了横岭烽按照唐代边塞烽候制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项目“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木简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1VJXG010)阶段性成果。

度相关规定,运用“土河”的侦查方式,每日在所属防区管辖内的楼兰路沿途进行巡逻侦查,巡查期间只发现了牛蹄印,并未发现人马踪迹。设置在楼兰路沿途的横岭烽地处沙漠边缘,远离中心城镇,地广人稀,周围交通均为砾路,崎岖难行。来往该道的商旅行人,需骑马才能至此。只见牛踪不见马迹,意为横岭烽辖区内的楼兰路沿途处于平安无警状态。牛踪或表明附近有零星居民和农牧业生产活动,但规模较小。

## 二

文书中涉及焉耆镇防体系的设置,对研究唐代边塞烽候制度的运行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 1. 焉耆、通海镇和横岭烽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一处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军事遗址,是唐代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沙堆烽”的故址,同时也是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游弈所的治所,为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镇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焉耆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四面环山,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沿库鲁克塔格山南,孔雀河北岸的道路地势平坦,沿途广置烽燧,是防御入侵最有效的措施。

经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和专项考古调查,最终确认了孔雀河烽燧群包括苏盖提、亚克仑、孙基、萨其该、阿克吾尔地克、沙鲁瓦克、库木什、卡勒塔、克亚克库都克、脱西克西、脱西克11座烽燧,自西北向东南沿孔雀河北岸直线分布。孔雀河烽燧群作为焉耆东部防区的军事预警线路,从现存烽燧分布情况推测,11座烽燧并不是唐代最初营建使用时期的数量。

游弈所在唐代文献典籍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在吐鲁番文书中却常被提及,其名称应与“游弈”这一兵种有关,是基层军事管理机构。目前尚未发现驻守在沙堆烽的游弈所的具体名称。吐鲁番阿拉沟戍堡中曾出土一批纸文书,黄楼根据文书内容,考订阿拉沟戍堡为西州鸛

鸛镇下属的鸛鸛游弈所治所,在编兵员48人<sup>[2]</sup>。沙堆烽出土多件木简有“烽子五人并得平安……烽帅某某”的记录,《通典·兵五》载:“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一人烽率。”<sup>[3]</sup>可知唐代每烽标准配置为6人,笔者推测治所在沙堆烽的游弈所至少管理8座烽燧(铺),而横岭烽即为游弈所下辖的烽燧之一。横岭烽距离游弈所治所沙堆烽(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应不会太远。

文书中所见烽燧名称多以地貌特征命名,如沙堆烽、怪泉烽、临河烽等,横岭烽可能也是依地貌特征命名的烽燧之一。横岭烽一名的来源,应与烽燧北部的库鲁克塔格山有关。文书中还发现有“横岭戍”“横岭铺”等,且有“横岭驻兵十四人”的记录,出土木简记载,楼兰路沿途的烽燧驻防兵力标配为一烽六人,“横岭驻兵十四人”表明横岭是一处军事要地,故驻防兵力较其他烽燧更多。在横岭烽可能还设置有“横岭戍”“横岭铺”,不仅需要做好警戒和防守,还需承担以书面形式骑马传递信号的任务。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中,既有横岭烽等烽铺状上游弈所、游弈所状上游海镇的纸质文书,也有各个烽铺状至游弈所的木简,所以通海镇既是横岭烽的上级,也是游弈所的上级机构,而游弈所是介于烽铺与镇之间的军事组织。“通海镇”不见于传世文献,但曾见于敦煌碑刻文献。《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载:“曾皇祖恪,前唐安西通海镇将军。”《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载:“皇考君讳伯伦,唐朝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鱼〕袋、上柱国、开国男……爰及慈母索氏,通海镇大将军之孙,德备周亲,贤资近戚。”<sup>[4]</sup>索氏为敦煌望门,敦煌文书《天宝十载前后沙州敦煌县退田簿》中有关于索恪的记载:“一段五亩,寿昌城西一百步,东索恪,西张,南阎言,北自田。”“一段三亩,寿昌城西五里,东索恪,西张什介,南渠,北涧。”<sup>[5]</sup>郑炳林认为,“索氏,通海镇大将军之孙”一语中的通海镇大将军即为唐代前期安西通海镇将军索恪<sup>[6]</sup>。陈国灿认为索恪任通海镇将军的时间,应在安史之乱以前<sup>[7]</sup>。

所谓镇,不是行政级别,而是军事性质,属于唐初的边境地区预警系统,即所谓镇戍制度。《新唐书·兵志》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sup>[10]</sup>镇分大小,镇的长官为镇将,副官为副将。《新唐书·百官志》载:“镇将、镇副、戍主、戍副,掌捍防守御。凡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五。”“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五十人为上戍,三十人为中戍,不及者为下戍。”<sup>[11]</sup>《唐六典》“三府督护州县官吏”条载:“上镇,将一人,正六品下;镇副一人,正七品下。录事一人;史二人。仓曹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佐一人;史二人。兵曹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佐二人;史二人。仓督一人;史二人。”<sup>[12]</sup>

显庆三年(658年)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至龟兹,设立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个军镇,谓“安西四镇”。为适应西域地区军事形势的变化,调露元年(679年)以碎叶代焉耆,开元七年(719年)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汤嘉惠又请以焉耆代碎叶而备四镇,在此期间焉耆都督府管理焉耆一切军镇事务。长寿元年(692年)之前,安西四镇每镇最多仅五百防人,镇防体制不完备。咸亨元年(670年)、仪凤二年(677年)、垂拱二年(686年)安西四镇三次沦陷。长寿元年,唐将王孝杰率武威道行军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鉴于以往教训,唐朝采取一项重要措施,修改了安西四镇的镇防体制,征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安西四镇。在安西都护府下设四镇镇抚,防御体制由府兵番上镇戍转变为节度使控制下的军镇驻防,四镇改为军镇编制,长官为镇守使或称镇使、军镇大使,职位较高,与都护属下之镇迥然不同<sup>[13]</sup>。镇守四镇戍兵需分散到四镇下辖各地以加强地方防务,将地方的防务尽量细分为一些小的戍区,具体体现在对“镇”设置的增加,即在原有四镇基础上建置了一些新的军镇,并配备一定额度的汉兵驻防<sup>[14]</sup>,通海镇应是此时在焉耆镇(焉耆都督府)下新设置的二级军镇之一。

## 2. 游弈和土河

唐代戍守烽燧的戍卒被称为“烽子”,即主

候望放烽,知文书、符牒、传递,又要警固、斲田、备烽具和准备粮草。《武经总要》云:“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取谨信有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一人掌送符牒,并二年一代,代日须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边境用兵时,更加卫五人兼守烽城,无卫兵则选乡丁武健者给仗充。”<sup>[15]</sup>《太白阴经》烽燧台篇载:“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传递。”<sup>[16]</sup>其中“放烽”是戍守烽燧的戍卒日常所承担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根据知更簿的安排,烽子每日按时站在烽燧顶部值班候望换防。烽子放烽包括在发生紧急军情时点火点烟报警和在日常的早晨与傍晚时分点烟点火报平安。

戍守烽燧的戍卒除固定在烽燧顶部站岗候望放烽外,还要承担各自辖区的“警固”任务,即需要侦查、了解烽燧管辖范围内有无敌情。唐代军事制度中有两种特有的侦查方式——游弈和土河,也是烽燧等基层军事机构常用来“警固”的重要手段。其中游弈亦作“游弋”,是在军中挑选熟悉山川地形的戍卒,每天前往烽燧周边巡逻,通过捕捉生人面孔来打探敌情,为一种机动的侦查方法。土河以静观动,在交通要道沿途上挖一个两丈宽的坑,其内填沙土,每天通过查看有无人或动物经过的踪迹,来刺察敌踪,判断有无敌情,是一种固定的侦查方法。游弈与土河两种侦查方式一动一静,常配合使用,两者虽分工不同,但性质相似,构成唐代军事制度中相辅相成且成一体系的侦查方式<sup>[17]</sup>。

《通典·兵五》载:“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断通,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sup>[18]</sup>《太白阴经》载:“置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截道凿之,横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早夜行检,扫令平净,有狐兔入境,亦知足迹多少,况于人马乎。”<sup>[19]</sup>《横岭烽》文书显示,横岭烽根据边塞烽候巡查制度的要求,在楼兰路沿途要道处进行布防,通过土河侦查方式,发现在管辖范围内只有牛经过的蹄印,并无人马踪迹,

并将巡查的情况向上级机构游弈所进行了汇报。这种通过“土河”获得野外巡查情报的方式,属于横岭烽所承担的日常工作任务之一——“警固”的范畴。

唐代边塞烽候使用的“土河”侦查方式,可能源自汉代军事侦查制度中的“天田”,是对汉代“天田”的继承和发展。《汉书·晁错传》苏林曰:“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人,一名天田。”<sup>[18]</sup>居延汉简中有大量关于天田的记载:“四月乙丑卒邓禄迹尽甲戌积十日,凡迹积卅日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七月戊子卒吴信迹尽壬寅积十五日,七月癸酉卒郭昌省茭,凡迹积卅日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户与戌不调利,天田不耕画,不锄治。”“六人画沙中天田,率人画三百步。”<sup>[19]</sup>敦煌《沙州都督府图经》中也有关于土河的记载:“一所土河右周回州境,东至碛口亭,去州五百一十里一百步,西至白山烽,去州卅里,南至沙山七里,北去神威烽,去州卅七里。汉武帝元鼎六年立,以为匈奴禁限,西凉王李嵩建初十一年又修立以防奸寇,至隋开皇十六年废。”<sup>[20]</sup>

天田、土河两种方式具有类似的功能,有特定的使用区域,只适宜地广人稀、气候干燥的西北边塞地区,显示出因地制宜的特点。孔雀河流域地处荒漠戈壁,干燥少雨,适宜采用土河这一侦查方式。《横岭烽》文书是目前唯一一件经科学考古发掘的,关于记载在西域地区实施“土河”侦查方式的文献资料。

### 3. 楼兰路

“楼兰”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sup>[21]</sup>。《史记·大宛列传》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sup>[22]</sup>据此推测楼兰在公元前176年已经建国,公元前126年已有都城。学术界多认为楼兰城位于丝绸之路北道,地处孔雀河流域<sup>[23]</sup>。

沿孔雀河经楼兰城前行的道路很早就已出现,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和汉王朝的联系加强,经楼兰的丝路北道成为汉初联系中原与西域诸国最主要的交通线路。该道是从敦

煌穿越白龙堆沙漠,沿孔雀河前往焉耆等西域诸国的主要通路,因路经楼兰都城,又被俗称为“楼兰道”。孟凡人言:“所谓楼兰道,系指连接敦煌和西域,以楼兰城东西一线为主要通道和分途点的交通干线而言。”<sup>[24]</sup>西汉时期,汉王朝为确保这一交通线路的畅通,在孔雀河流域沿途的渠梨、伊循等地驻兵屯田积谷。东汉时期,虽然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屯田时断时续,但一直注重在丝路北道沿线的屯田事宜,索勋、班勇屯田楼兰就是这一政策的延续。《后汉书·班勇传》载:“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延光二年(123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sup>[25]</sup>魏晋之后随着孔雀河水量的减少,楼兰道沿途逐渐荒漠化而多沙碛。虽然楼兰道日渐萧条,但始终保持畅通,至迟到隋代,该道被称为大碛路。笔者认为,“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并非指大碛路完全不能通行,应是由于沿途缺水,道路经年未修,基础配套设施薄弱,不适宜大规模商旅使团行进,不能承担官道的职责,但该道依然是可以通行的。白龙堆东北部古道曾发现900余枚开元通宝<sup>[26]</sup>,表明初唐时期该道仍有商旅通过。

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沙州伊州地志》斯367号、《沙州地志》伯5034号文书对石城镇(今若羌县)周边的交通有详细描述:“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sup>[27]</sup>该道是沟通石城镇与焉耆镇的主要通道,关于该道的具体走向,有学者认为与清代驿路基本相同<sup>[28]</sup>。《新疆图志·道路志》详细记载了从若羌至焉耆驿路情况,沿途共设有罗布、和罕、托和莽、阿拉竿、哈喇台、都拉里、合十墩、古斯拉克、乌鲁可力、英格可里、河拉、英气盖、克宜尔、库尔勒、紫泥泉等十五个驿站<sup>[29]</sup>。从清代驿道走向来看,具体路线与今若羌县至库尔勒市、焉耆县的218国道一致,该道沿途考古调查中不见任何唐代遗存。唐代文献记载石城镇至焉耆镇通道有“相距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等几

个特点,今若羌县至焉耆县公路里程约480公里,“一千六百里”无论按照唐代大里531米或小里442.5米换算<sup>[30]</sup>,古今道路里数均相差甚远。清代驿道距离罗布泊较远,亦不符合“路当蒲昌海”的特点。笔者认为唐代石城镇至焉耆镇的交通道路与清代驿道不同,仍然沿用汉晋时期的“楼兰道”,其中石城镇至楼兰城的一段为沟通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干线交通的南北向支线,而由楼兰城至焉耆镇路段为楼兰道东西一线主要交通,也是汉代丝绸之路北道、魏晋时期中道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楼兰道在唐代仍然可以通行,又无天险可依,唐王朝在构筑焉耆镇防御体系时,对该处进行了重点布控。文书将沿孔雀河布控防御的道路称为“楼兰路”,在该道沿途设置有通海镇、榆林镇、掩耳守捉、沙堆烽、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苏累铺、黑河铺、猪泉谷铺、慳泉谷铺等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构筑了东境镇防体系。

唐代历史文献和出土文书中有多件关于“路”的记载,如《元和郡县志》:“俱六镇,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当碎叶路。凭落镇,在府西三百七十里。神仙镇,在府南五十里,当西州路。沙钵镇,在府西五十里,当碎叶路。蒲类镇在蒲类县西。郝遮镇,在蒲类县东北四十里,当回鹘路。盐泉镇在蒲类东北二百里,当回鹘路。特罗堡子,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四面有磧,置堡子处周回约二十里,有好水草,即往回鹘之东路。”<sup>[31]</sup>其中凭落、沙钵两镇戍守在庭州向西通往碎叶镇的道路沿途,神仙镇戍守在庭州向南通往西州的道路沿途,蒲类、盐泉、特罗堡子三镇戍守在庭州向东通往回鹘牙帐的道路沿途。碎叶路、西州路、回鹘路这些道路的命名就是根据各镇防御道路通往的终点——碎叶、西州、回鹘而命名的。

“楼兰路”是唐代焉耆镇治所(今焉耆县四十里城子一带)至楼兰城的交通要道,也是汉代丝绸之路北道、魏晋时期的中道、隋末大磧路及“楼兰道”路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楼兰路”是焉耆镇辖区内重要的军事防御线路,是唐代对该道特有的称呼,它的名称可能就是根据

“楼兰城”命名的。楼兰路沿途也有众多支线,穿越北山山谷,可直达西州(吐鲁番)和焉耆中心城镇区域,这些支线的戍守任务也都并属楼兰路沿途军事防御区域。楼兰路沿途不但设置镇、守捉、游奕所、烽、铺等不同性质和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同时还在该道沿途修筑有交通设施“馆”,配置有“长行马”往来于该道,形成了立体式的防御体系,构成了焉耆东境的军事屏障。

关于通海镇的位置,陈国灿根据《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推测,“通海镇”是在通西海的地区开辟设置的镇。“西海”指热海,即今伊塞克湖。通海镇或是由安西通向热海的路途上所设之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统领<sup>[32]</sup>。通过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工作,我们确定了通海镇为焉耆镇下属的二级军镇,所以其位置应在焉耆镇管辖范围内。考古调查发现唐代军镇、守捉、烽铺都设置在其防御线路上,每镇管辖重点就是一条重要通道,故通海镇的名称应和楼兰路有密切关系。楼兰路是从焉耆镇沿孔雀河至罗布泊北岸楼兰城的交通干道,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地势最低的地方,在汉晋时期被称为渤泽、牢兰海、盐泽、盐水等,唐代则被称为蒲昌海,隶属于石城镇(若羌县)。《沙州地志》记载:“一所蒲昌海:右在石城镇东北三百二十里。据《汉书·西域传》: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阨,于阨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焉。”<sup>[33]</sup>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石城镇划归沙州;《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大周天授二年腊月,为迎合武则天统治盛世,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向沙州刺史李无亏呈报蒲昌海五色祥瑞之事,状称:“蒲昌海水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清明彻底,其水五色。”<sup>[34]</sup>沿孔雀河北岸前行,途经楼兰城、蒲昌海的交通——楼兰路,也是焉耆向东前往中原地区的捷径,所以通海镇的“海”应指蒲昌海,其位置就在焉耆通往蒲昌海的道路即楼兰路沿途。

## 三

唐贞观十八年(644年)郭孝恪讨焉耆,显庆三年(658年)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军大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到龟兹,设立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个军镇。上元初,根据西域地区军情变化,在焉耆置都督府进一步加强对焉耆镇的管理<sup>[5]</sup>。

根据考古调查,我们发现以焉耆镇为中心,在周边交通道路沿途都设置有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呈辐射状拱卫焉耆镇。焉耆镇设立初期防守重点是西突厥,随着吐蕃的崛起,西域地区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焉耆东境从后方逐渐演变为前沿阵地。7世纪中叶,吐蕃已在阿尔金山一带频繁活动,总章元年(668年),吐蕃经阿尔金山“于且末国建造堡垒”。石城镇、播仙镇等于720年即被占领。唐与吐蕃进行多次拉锯战,石城镇几易其手。从沙州、石城镇通过楼兰路都可以直接到达焉耆,“铁关、于术,四镇咽喉,倘为贼所守,事乃交切”<sup>[6]</sup>。焉耆作为连接南北两大都护府的咽喉要地,一旦被吐蕃占领,南北疆将被分割,所以焉耆镇东部的孔雀河一线,具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需要严密防守。沿孔雀河流域的楼兰路沿途设置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就是根据西域地区军事形势的变化,为防备吐蕃在焉耆东边日益增加的活动而做出的调整。楼兰路沿途设置的各级机构严格按照唐代边塞烽候制度进行巡查防备,形成立体式的严密军事防线,成为焉耆镇镇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横岭烽》文书即是防御吐蕃的进犯,在西域边塞地区严格执行唐代烽候巡查制度,对西域地区实施有效管辖和治理的重要物证资料。

[1] 黄楼《唐代西州鹑鹑镇文书研究》,《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

[2] 同[1]。

[3]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五二《兵五》,第3901页,中华书局,1988年。

- [4] 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第720、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5]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355、358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 [6] 郑炳林《〈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考释》,《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郑炳林《〈索勋纪德碑〉研究》,《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
- [7] 陈国灿《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
- [8]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8页,中华书局,1975年。
- [9]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第1320页,中华书局,1975年。
- [10]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755页,中华书局,1992年。
- [11] 孟宪实《于阗: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12] 同[7]。
- [13] (宋)曾公亮等著,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第73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
- [14] (唐)李筌著、盛冬铃译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第12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5] 徐志斌《土河与游弈》,《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 [16] 同[3]。
- [17] 同[14],第127页。
- [18]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2287页,中华书局,1962年。
-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第13、19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汉简研究文集》,第195、19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 [20]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4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 [21]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6页,中华书局,1959年。
- [2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0页,中华书局,1959年。
- [23] 榎一雄《鄯善の都城の位置とその移動について》,《榎一雄著作集》,汲古书院,1992年;長澤和俊《楼蘭王国史の研究》,雄山閣,1994年;陈戈《米兰古灌溉渠道及相关的一些问题》,《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侯灿《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文物》

- 1995年第6期;黄盛璋《初论楼兰国始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1996年第8期;陈晓露《楼兰考古》,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胡兴军、何丽萍《新疆尉犁县咸水泉古城的发现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胡兴军《楼兰、鄯善都城新考》,《新疆文物》2017年第2期。
- [24] 孟凡人《楼兰考古学的重要性与开展楼兰考古工作的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可行性》,《新疆文物考古资料汇编》(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
- [25] 《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第1588、1589页,中华书局,1965年。
- [26] 李江风《楼兰王国的消亡和丝路变迁与气候关系》,《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 [27] 邱陵《罗布淖尔资料辑》,《新疆文物》1991年。
- [28] 孟凡人《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第36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 [29] (清)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第1541~15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30] 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 [31]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第1034页,中华书局,1983年。
- [32] 同[7]。
- [33] 同[20],第49页。
- [34] 同[20],第19页。
- [35]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第1648、1649页,中华书局,1975年。
- [36] (唐)张九龄《敕西州都督张待宾书》,《全唐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 (责任编辑:吴然)

· 新书介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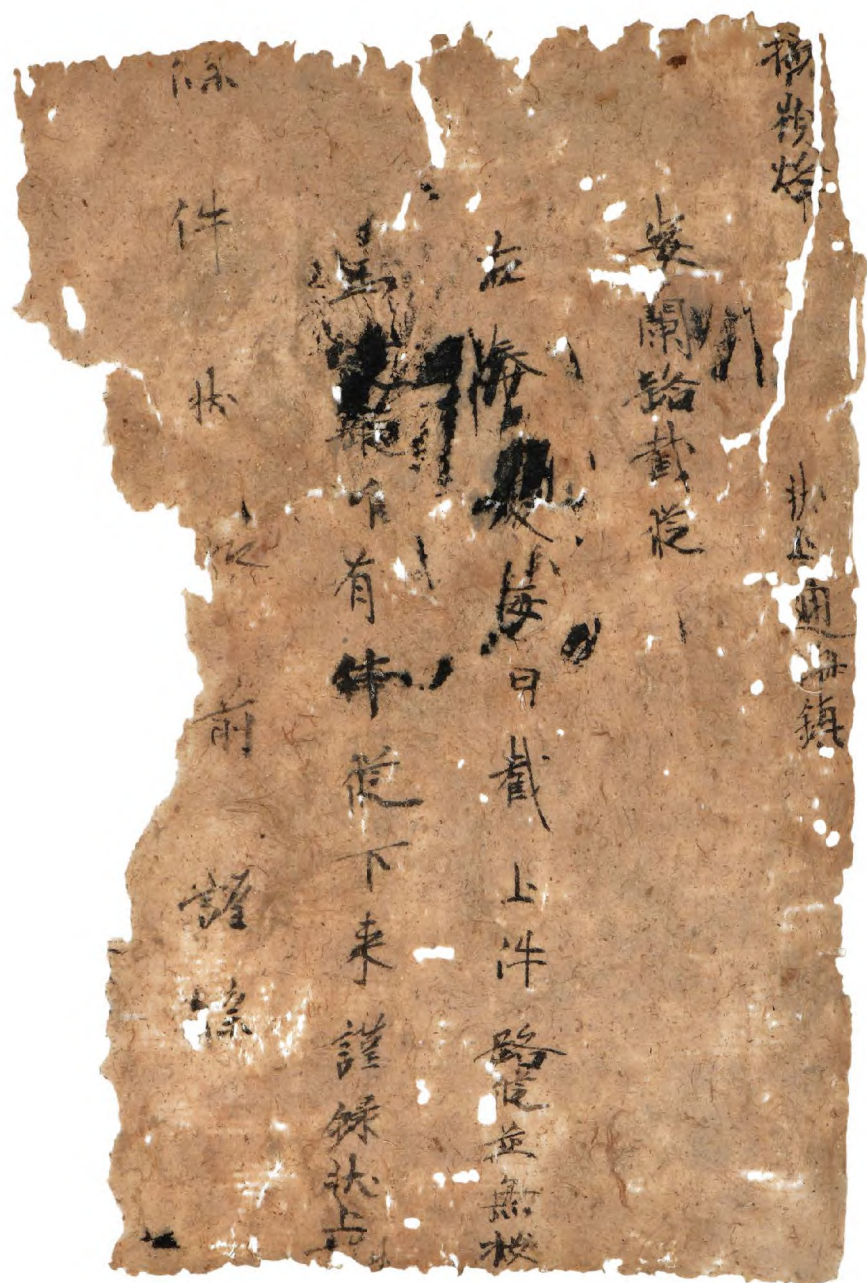
## 翟门生的世界——丝绸之路上的使者

吴强华 赵超 编著

本书的出版是配合在深圳市南山博物馆举办的同名展览,展览中最重要的文物是东魏时期的“翟门生石床屏风和石门”。该组文物具有目前唯一的北朝外来士人肖像、唯一的石门墓志及唯一的北方竹林七贤画像等重要文化信息。墓志主人翟育,字门生,原为翟国“萨甫”,作为“使主”出使北魏后留居洛阳,葬于东魏武定元年(543年)。本书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日本佛教大学教授黑田彰、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员任志录、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4位学者的论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精装 大16开 定价460元

#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出土唐代文书



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楼兰路截踪事